



论郭店楚简“情”的内涵

(2005-6-29 13:57:07)

作者：丁四新

[摘要] 通过对郭店楚简《性自命出》等篇中的“情”义内涵的分析，本文认为其中的“情”仍然是“真实”，而不是“情感”之义。“情”在不同语境中虽有多种分析的含义，但它们之间是统一的，皆根源于性情论之“情”。本文并就《性自命出》是否具有“性情论”的性质，给出有力的证明。所有这些，为我们重构先秦性情论的正式内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从“未发”和“已发”而言，“性”与“情”二者在郭店楚简中并不具备相互对应的特性，这与宋儒的性情论并不相同。从先秦到宋明的性情论，朱熹等人利用先秦儒家的相关文献作了创造性的转化；而Chad Hansen和A. C. Graham对中国早期文献中“情”字义的某些观点，值得商榷。

[关键词] 情，真实，情感，性情论，郭店楚简，《性自命出》

“情”，无论是在中国古典文本中，还是在现代中国思想中，它都是一个颇为重要的文化、心理和哲学概念。从现有情况来看，海外汉学家的见解并不亚于本土学者的研究成就。郭店楚简发表以后，由于《性自命出》等篇的相关内容颇为丰富，思想十分深入，因而又一次激发了人们对“情”的思考。有“情”义的内涵，学者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认为，郭店楚简尤其是《性自命出》篇颇为重“情”。但是此“情”到底为何“情”？学者们的回答并非完全一致，有些理解显然值得商榷。

一、由《性自命出》、《语丛二》反思“情”与“性”的关系

郭店楚简论“性”、“情”颇为丰富，所以有些学者主张将郭店楚简《性自命出》命名为《性情》篇，这一观点得到了上博楚简编者的响应，他们径直将其整理的竹简称为《性情论》。但是“情”与“性”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则是我们需要切实回答的问题。

对于性、情的关系，宋儒有明确的理解。朱熹说：“心如水。性犹水之静，情则性之流，欲则水之波澜。”又说：“有这性，便发出这情；因这情，便见得这性。”《中庸》云：“喜怒哀乐之未发，谓之中；发而皆中节，谓之和。”朱熹《集注》云：“喜怒哀乐，情也；其未发，则性也。无所偏倚，故谓之中。发皆中节，情之正也；无所乖戾，故谓之和。”显然，在朱熹的哲学架构中，性与情是完全对应的。在朱熹之后，他的弟子陈淳对他有关性情关系的理论解释得至为明确：

情与性相对。情者，性之动也。在心里面未发动底是性，事物触着便发动出来是情。寂然不动是性，感而遂通是情。这动底只是就性中发出来，不是别物，其大目则为喜、怒、哀、惧、爱、恶、欲七者。《中庸》只言喜怒哀乐四个，孟子又指恻隐、羞恶、辞逊、是非四端而言，大抵都是情。性中有仁，动出为恻隐；性中有义，动出为羞恶；性中有礼智，动出为辞逊、是非。端是端绪，里面有这物，其端绪便发出从外来。若内无仁义礼智，则其发也，安得有此四端？大概心是个物，贮此性，发出底便是情。孟子曰“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。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”云云。恻隐、羞恶等以情言，仁义等以性言。必又言心在其中者，所以统情性而为之主也。孟子此处说得却备。又如《大学》所谓忧患、好乐及亲爱、畏敬等，皆是情。

从朱熹和陈淳的论述来看，宋明儒关于性情关系的基本思维框架当来自《中庸》关于“已发”、“未发”的陈述，他们并以此来理解《孟子》等书；反过来，通过对《孟子》、《乐记》，乃至《易传》的相关论述和阐释，加深和扩展了对儒家性情论的理解。这便是“心统（主）性情”论的提出。从陈淳等人的论述来看，仁、义、礼、智四者为性，四端七情（恻隐、羞恶、辞逊、是非，喜、怒、哀、惧、爱、恶、欲）及忧患、好乐、亲爱、畏敬等，皆是“情”。显而易见，“情”是相对于“性”之发，从“已发”言其无所不具的一个概念；同时从其外延来看，宋儒所理解的“情”又重在情感上面。无可否认，这些观念已经构成了我们理解郭店楚简的“先见”（pre-understandings），但是这些“先见”是否符合郭店楚简论“情”的实际，则当然需要我们做出一番审慎的辨析与考

察。

《性自命出》第2-5简说：“喜怒哀悲之气，性也。及其见于外，则物取之也。性自命出，命自天降。道始于情，情生于性。始者近情，终者近义。知情[者能]出之，知义者能入之。好恶，性也；所好所恶，物也。善不[善，性也]；所善所不善，势也。”“情”是从何物生出的？根据简文，“情”是由“性”生出的。但是，“情”是什么，是“喜怒哀悲之气”吗？《性自命出》并没有直接的文本回答。但是有的学者根据宋儒的理解，除了将“性”理解为“喜怒哀悲之气”，即《中庸》所说的“未发之中”的状态外，还径直将其“已发”的状态，如喜、怒、哀、悲，断定为所谓的“情”。在此，我认为这一论断是需要受到严格的反思和怀疑的。

根据上引简文，我们可以对《性自命出》中由性所生之物列举如下：

[1] 喜怒哀悲之气，性也。

[2] 情生于性。

[3] 好恶，性也。

[4] 善不善，性也。

另外，第39至40简也有两个相关的陈述：

[5] 仁，性之方也，性或生之。

[6] 信，情之方也，情出于性。

由上面所列出的6条引文来看，可以推断这些由性所生之物呈现出并列的关系，也即是说，喜怒哀悲之气、情、好恶、善不善、仁皆由性生出。如果我们不能进一步断定它们必定如此，那么至少在陈述方式上，它们所表现出来的逻辑关系是平行、并列的，看不出它们之间有任何从属的关系。这样的观察和陈述，还可以在《语丛二》中得到更为显豁的证明。

《语丛二》有关性生诸物的陈述是这样的：

[7] 情生于性，礼生于情，严生于礼，敬生于严，望生于敬，耻生于望，愬生于耻，廉生于愬。（简1-4）

[8] 爱生于性，亲生于爱，忠生于亲。（简8-9）

[9] 欲生于性，虑生于欲，倍（悖）生于虑，争生于悖，党生于争。（简10-12）

[10] 智生于性，卯生于智，悦生于卯，好生于悦，从生于好。（简20-22）

[11] 子（慈）生于性，易生于子，肆生于易，容生于肆。（简23-23）

[12] 恶生于性，怒生于恶，乘生于怒，悝生于乘，惻生于悝。（简25-27）

[13] 喜生于性，乐生于喜，悲生于乐。（简28-29）

[14] 愠生于性，忧生于愠，哀生于忧。（简30-31）

[15] 瞿生于性，监生于瞿，望生于监。（简32-33）

[16] 强生于性，立生于强，断生于立。

[17] 弱生于性，疑生于弱，北生于疑。（简36-37）

比较《语丛二》与《性自命出》的相关内容，可以看出二者有异有同。其所同者，皆是平铺地直列由“性”所生或所由以出的概念系列，且“情”并不囊括其它诸种概念，与“性”完全对应、对称。其所不同者，《语丛二》比《性自命出》所言性之生的系列更为丰富，但《性自命出》由于自身文本的重要特性，使其相关的论说显得更为深刻。我认为，有如下几点是值得密切注意的：

其一，这两篇简文都有情生于性和恶生于性，及礼生于情的说法，表明它们之间具有很强的一致性。尤其需要指出的是，这个“情”是由性所生之情，同时是礼乐之作的直接来源。但是此“情”的具体内涵指什么？是值得引起深切关注的问题。

其二，在《性自命出》中以“气”陈述出来的喜怒哀悲者是性，而在《语丛二》中则说爱、慈、喜、愠出于性，显然已不是所谓“气”者。这种差别似乎表明，当人的情感尚处于“气”的存在状态时，就是所谓涵于中的“性”，反之就是表现出来的各种具体感情。而《性自命出》说“好恶，性也；所好所恶，物也”，又说“善不善，性也；所善所不善，势也”，似乎“好恶”、“善不善”都有《中庸》“未发”、“已发”的问题，显然逸出了“情”、“性”相对应的理解框架。

其三，《语丛二》对众多的名词、概念之间的相生关系进行了探索和连接，这与《性自命出》区别较为明显。后者说“喜怒哀悲之气，性也”，从已发的角度来说，当衍生为喜生于性，怒生于性，哀生于性，悲生于性；可是在《语丛二》中却是“恶生于性，怒生于恶”，“愠生于性，忧生于愠，哀生于忧”，“喜生于性，乐生于喜，悲生于乐”，怒、哀、悲三者并非直接生于性，并且悲是由喜转生出来的。如何理解这一差别？《性自命出》第29-30简

说：“凡至乐必悲，哭亦悲，皆至其情也。哀、乐，其性相近，是故其心不远。”第31-32简说：“凡忧思而后悲，凡乐思而后忻。”第34简说：“愠斯忧。”从这三条材料可以看出，在《性自命出》中愠、忧、悲及哀、乐之间也具有转生关系，与《语丛二》相同。这表明，《性自命出》的作者也在思考人的情感之间的内在联系与转化关系。不过一者尚比较笼统，一者颇为细密，相信《语丛二》是《性自命出》在相关内容上的继续和发展。

[\[第 1 页\]](#)

[\[第 2 页\]](#)

[\[第 3 页\]](#)

[\[第 4 页\]](#)

[\[第 5 页\]](#)

[\[关闭窗口\]](#)